

第一章 中国人和外国人给中国取的名字及契丹和蛮子国

这个国家有一个惯例，每当新家族登上帝国宝座，就给他的国家取一个新的名字。因此在前朝的统治下，中国叫做大明朝，这即是说光明之国。但现今的统治者鞑靼人称它为大清朝，即至为清纯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称呼。然而考虑到其中过去的王国，或因历史悠久，或因有王公贤人的德行，或因其他特点而非常出名，他们迄今在使用的名册中仍保留和使用，诸如夏朝、商朝、周朝、汉朝等等。我们由此得知，尽管这些名称都表示中国，不如说它们指的是几个皇室的朝代，而非表示中国本身。

在他们的典籍和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他们通常使用上国（*Xam Que*）这个名字，即高尚优异的国家。文人在他们的著述和书籍中选择中国（*Chum Que*）^①一名，表示中央，即中心的花朵。因此最常用来称呼中国的名字确实是“中国”，即中央的王国；用此名称呼它，或因他们认为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或因中国的第一位国王在当时所在的河南（*Ho Nan*）省，帝国的中央，建立他的王位，或者最后因为它比四周的蛮夷和穷邦更重要。同样夸张的名字，“天下”，即包括天底下一切的王国，也经常使用。所以当他们说“天下太平”，天底下一切平安，其义也等于说中国太平。中国还有其

应为 *Chum Hoa* 英文版错排。

他的名字，我不再提说，因为它们较少使用。

外国人称中国为 Hara Kitai、Catai、Cataio、Mangi、Nica Corum、Chin、China 及 Kina。位于西面的鞑靼人把中国人叫做 Hara Kitai，即黑色蛮人，这也是他们称中国本身的名字。欧洲人不说 Hara 而说 Cara，因为考虑到鞑靼人用极强的气音读 Ha 外人认为他们读作 Cara 而非 Hara^①。因这个缘故，马可·波罗及其他作者把 1260 年和 1275 年间征服西鞑靼地及全中国的皇帝名字叫做 Can 而不是叫他为 Han^②，在西鞑靼人的语言中也就是国王。迄今西鞑靼人仍使用同一名称，他们曾是中国的统治者，而从前他们野蛮到没有任何国王，也没有表示国王的名词，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对此加以叙述。

我听某些住在这宫廷中的人说，莫斯科人（Muscovites）模仿鞑靼人把中国叫做 Kitai^③。撒马尔罕（Chahamalaha）国，其居民为回教徒，并与陕西（Xen Si）省相近，土默（Tumet）即西藏（Tibet），其大部分与陕西和山西（Xan Si）省相邻，及乌思国（Usanguè）与四川（Su Chuen）省接壤，它们都误读 Kita 一词，把它叫做 Katai，而来自印度斯坦及印度其他地区的人称它为 Cataio。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曾在西藏居住过的安东尼·德·安德拉吉（Anthony de Andrade）神父在他的《西藏纪事》中提及的 Cataio 国，指的正是中国，而大 Cataio 正是大中国；前面提到有关中国的任何名字，只可作如此解释。更因为在印度和亚洲极东地区之间的国家，只有临海的地方为人所知，其余的则是边远、野蛮、贫穷和未开垦的。

① 西鞑靼人为蒙古人，东鞑靼人为满族人，欧洲人习惯用鞑靼一名称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 Tartar 一名来自曾在蒙古草原上强大的塔塔儿部。

② Cara Kitai 即黑契丹，指西辽。西辽曾在中亚建立强大的王国，所以契丹一名也传至西方。

③ Can（Han）汉语的“汗（罕）”突厥王号，蒙古帝王也用以作称号，如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

④ Kitai 即契丹的译音，至今俄语仍称中国为 Kitai。

东鞑靼人蔑称中国为 Nica Corum 即蛮国 尽管现在他们已在那里定居, 并且成为它的统治者, 他们仍称它为 Tulimpa Corum, 即中央的国家。印度诸国, 如坎纳拉 (Canara)、孟加拉 (Bengala) 及其他国家 称它为 Chin 这是两个人在四川告诉我的 其中一人曾在果阿 (Goa) 居住过 并且曾学习了一些葡语词句 同时 我在北京 (Pekim) 从该国的几个商人处也得知这一点。Chin 这个名字, 看来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可能来源于晋 (Chin) 朝 然而我认为更应该相信它来自公元前 246 年的秦 (Cin) 朝 该朝的国王统治全中国, 并且及于距孟加拉不远的云南 Yûn Nân 省 因中国人读音重, 从齿间呼出 Cin 这个词, 印度人不能模仿他们, 把它读成 Chin 而葡萄牙人从印度人处得知这个词 因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以 n 结尾的词, 就在末尾加上一个 a。意大利人像葡人一样写作 China 但把它读成 Kina; 所以他们都必须把它写作 Cina 使它的读音如德国人所写的 Schina。

如上所说 我们清楚地看到, Cataio、Hara、Kitai 和 China 是一回事 并非如克鲁维林 Cluverius 所说它们是不同的国家 他在他的《地理学入门》第五卷第五章中 编造了几个诸如 Catai、Tangut、Tainfu 等国家, 看来他是从马可·波罗的书中引用这些地名的; 然而它们不是国名, 仅是中国某些城名的错讹。这特别从 Tainfu 一名可看出来, 它不过是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府 (Tai Yuen Fu) 鞑靼人征服北京之前在那里建立朝廷。克鲁维林对 Tainfu 的描写也完全符合该城及附属地区的情况, 因为那里产中国最好的葡萄 在路安 (Lû Gân) 城一带有大量的铁 供应北京及其余的省 特别是北方的省份 有铁钉 各种铁器皿及工具。马可·波罗谈到该省的另一地方 他叫做 Pianfu, 尽管中国人称它为平阳府 (Pim Yam Fu)。克鲁维林还借用马可·波罗一个错讹的名字 Cambalu, 契丹的首都; 因东鞑靼人和西鞑靼人的语音中都没有 B 音 如我

路安, 今山西长治。

们在谈鞑靼字母时将适时指出，所以马可·波罗应把 Cam 写作 Han 即国王 把 Balu 写作 Palu 其义为宫廷 最后把 Cambalu 写作 Hanpalu，它在鞑靼语中意为王廷^①。然而他应知道有两个 Hanpalu 即王廷 旧宫廷 今天仅为一个不足道的地方 在北京以东约三里格 它叫做都城 Tum Cheum) 而新宫廷即北京 马可·波罗称之为 Taidu 而非 Taitu 其意为大都。

有的作者提出 马可·波罗经常谈到的 Mangi 国 和中国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者显然在中国的范围內。因为马可·波罗把中国分为两个国家，Catai 和 Mangi：以 Catai 为名的国包括所有北部省份，Mangi 则包括南部省份。Mangi 一名来源于蛮子 (Mânt Zù) 意为野蛮人。因为南部的中国人 为嘲笑北方人，把他们叫做北狄 (Pe Tai) 意指北方的愚民 而另一方的人则同样对待南方的中国人，称他们为南蛮 (Nân Mán) 意指南方的蛮人，或仅称为蛮子 (Mantzu) 野蛮人。鞑靼人因蔑视中国人，也称他们为蛮子。但因鞑靼人 特别是东鞑靼人 不能发好 tzu 这个音 他们读作 gi, Mangi；我在与他们生活的二十三年中曾多次听他们这样读。因此毫无疑问，在马可·波罗时代 他作为一名外国人 不懂语言的真意 但听见鞑靼人常称南方的中国人为 Mangi，便误认为它是国家或民族的名字，而不是一种蔑称。

不管怎样，可能不会再有疑问说 Catai 和 Mangi 是截然不同的国家 并非都指中国 这里我将译一段马可·波罗书第二卷第四章的话 从中可明显看出 我所肯定的 是确切而真实的。他在前一章中谈到一条大河 因其河身宽阔 中国人称之为扬子江 (Yâm Cu Kiam) 即海洋之子 接着他作了如下的叙述：

“Caingui 是这条河南岸的一座小城，那里盛产谷米，大部分运往 Cambalu 供应大汗的宫廷。这些粮食从水路运往 Catai 经过河流湖泊 及一条大而深的运河 这是大汗命令修造的 以便船只从

即汗八里，王城，palu、balu 均为 Baliq“城”的讹讹。

一条河驶往另一条，从 Mangi 省到 Cambalu 不用走海路。就位置和长度来说它是一个奇迹，使一些城市受益良多。为了便于旅客通行，大汗还命令在沿所述河流和运河两岸修筑非常坚实和宽阔的大堤。”以上是马可·波罗的话，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谈及这一伟大的工程。

但马可·波罗提到的 Caingui 恰当地说 非城非镇 中国人称它为子江口 (Chim Kiam Keu) 即河的儿子口 因为在该地有一条分开的支流，它流经南京 (Nan Kim 省) 后 从浙江 (Che Kiam) 地方直达名为杭州 (Ham Cheu) 的省城。在这河口的两岸，有一座中国人称为码头 (Mā Teū) 的堡，这是一个生意人经常往来的地方。因为船只到达这里并在夜间安全停靠。马可·波罗谈到的这个地方，因为船只云集，可以称为一个镇，尽管它没有城墙也没有建筑足以成为一座城市。

尽管在这个国家当传教士的人，现在对此已完全了解，但我仍不能不把这件事谈得更为清楚，阐明同一作者的某些其他篇章，从他在书中提到的许多城名开始。在第二卷第二十七章中他谈到 Tainfu 城，中国人称之为太原府，如我们前面所说，那是山西省的省会。在第二十八章中他谈到该省的另一城市，中国人叫做平阳府，属于第二等级，除了南京省的苏州 (Su Cheu) 之外，它是全国最富有和最具实力的城市。第五十六章中他谈到 Caiganzū 城，即河间府 (Hoai Gân Fū) 它是一个商业兴旺的镇，十分富足，因为这里及其四周地区盛产盐，并从这里运往该帝国的其他地方，如马可·波罗在同一章中所说。第六十五章中他谈到 Chian Gian Fu 即靖江府 (Chim Kiam Fu)。在第七十章中他描写了 Tapinxu 城，即南京省的太平府 (Tai Pin Fu)。第七十五章中他提到 Fogiu 城，即福建 (Fo Kien) 省的省会福州 (Fo Cheu)。第七十六章中，他谈到 Kuelin Fu 即桂林府 (Kien Nim Fu)。他说这个城有许多狮子；在别处他几次重复如此说；这使我们明白他在许多事上的报道都有错误，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狮子，图画上都没有。所以他们

把狮子画得完全像另外一种动物。对于我来说，我认为马可·波罗把该国常见的大而凶猛的老虎误认为狮子。这个看法可用他的话作证：在第二卷第十四章中他说大汗用训练好的狮子去追捕野兽；而它们有白、黑和红色的线条即花纹，比巴比伦的狮子大。这些描写完全符合几个亚洲王公用来狩猎的老虎或豹子的形象，但根本不像对狮子的描述。他还提到另外一些城市，其名字变化甚大，以致它们远非中国的城名，不像中国的语言。不管怎样，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所谈的契丹和蛮子的省份和城市，都属于中国，因为它们一般都以音节 fu 结尾，中国话中其意为城。例如广东省的首府是广州府 (Kuam Cheu Fu)，广州是本名，与其余部分分开来，而府的意思是城，有如希腊人的堡 (Polu) 所以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olis) 意思是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的城 还有阿德里安堡 (Adrianopolis) 即阿德里安 (Adrian) 的城。

我们获得的第二个证明，是马可·波罗在其著作的第二卷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中对北京新、旧城及皇宫所作的描述，因为他所说的都符合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也符合我们在本书中所描绘的。

第三个是宫廷中饮用的酒和烧用的石煤，称之为煤 (Muy)。这种煤是从距该城两里格的山区运来，奇怪的是这里矿藏永不枯竭，尽管已逾四千年，不仅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而且该省的大部分地区都用这种煤，消耗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任何家庭、不管多么穷，都有一个用这种煤取暖的暖室 (热炕^①) 它的热度大大高于木炭。这种暖室 (热炕) 用砖砌成，如同床和卧榻一样。有三四掌高，其宽窄视家庭人数而定。暖室 (热炕) 上铺有席垫或毡毯，人在上面躺卧、睡觉。白天则坐在席上或毯上，没有暖室 (热炕) 则难以忍受严寒。在暖室旁边，有一个添煤的小灶，它的火焰和热力通过管道使整个暖室温暖。暖室有一个通向外面的小口，人们用它烧饭、温酒、煮茶 (Cha)；因为他们总是喝热饮料。有钱

即北方的炕。

人的厅堂和卧室都有暖室，但与穷人的不同，不是凸起的，而是在地下 以地板作为暖室。人们在上面吃喝、念书、行走和睡眠 或在毯上、炕上 或在椅上。贵人和曼达林的厨师 需用炉火的工匠 如铁匠、面包师、染工等等 不论冬、夏都使用这种煤。它的烟和热非常强烈 不少人因此窒息 有时碰巧暖室 热炕 着火 睡在上面的人就被烧死。因而，为了避免这种烟火的危害，就需要在暖室旁放一个大盆，盛满干净的清水。由于烟入水与水混合，以致第二天水味和烟味一样奇臭难闻。

第四个证明是马可·波罗在第二卷第三十七章中描写的一座著名的桥，位于北京以西两里格半，文字如下：“当你离开汗八里，行走十哩路后，就遇到一条河，叫做普里桑乾（Puli Sangar）流入大海，可航行许多运载商品的船只。这条河上有一座非常美观的石桥，世上或许没有类似它的。这座桥的长度为三百几何步，宽八步，十骑可以并排而行。桥有二十四拱，由二十五个石墩立在水中支撑，完全是用精美的蛇纹石建成。两边的护栏采用大理石板，桥柱排列得十分匀称。它的两端比隆起的顶端要宽，但当你走到桥上，就可发现它平坦得如同一条线似的。那里有一非常高大的碑、竖立在一个大理石龟上，靠近底部有一个大石狮子，其上还有一狮。与它相对有另一极美之碑，及一狮，距前者约一步半。栏杆的支柱之间 相距一呎半 中间有大理石板 上面有各种雕饰 以防止人们掉进河里。总之，每根柱上都有一个大理石狮子，看起来十分悦目。”以上是马可·波罗的描述。看来印刷者在末尾忘记了一些话，使作者的记述含糊不清。不管怎样，我是按照原样，根据桥的结构将它译出。

这座桥是中国最美丽的桥，但不是最大的，因为还有更长的桥。作者说这条河叫做普里桑乾，这是西鞑靼人给它取的名字，他们当时统治全国，但有许多西鞑靼人在北京仍混合于东鞑靼人之中。中国人称这条河为浑河（Hoen Ho）即浑浊的河 因为河水急湍 带来大量泥沙 使它全年浑浊。马可·波罗说这座桥有二十四

拱，然而它只有十三拱，至于说舟船可在这条河上航行，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它水位很高，由于落差很大，迂回及布满岩石，而不能通航。导致马可·波罗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往西大约三里格远另有一条河及一座二十四拱的桥。其中五个在中央成拱形，其余是平的，铺以既长且宽的大理石板，结构精美，平坦宛如一条直线。在桥中间可以看见马可·波罗所说的石碑。这条河叫做琉璃河（Cieu Li Hô）即玻璃河，因为它清澈、安静，并可通航。从而你可发现作者是把这一座桥误认为另一座桥：头一座是中国最美丽的，由于它的优秀工艺和制作材料，可能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它全部用最好的白大理石，按照完美的建筑学规则精工修造。两侧共有一百四十个支柱，每边七十柱，柱与柱间相距一步半，中间装有大理石方板，上面雕刻着各种花朵、水果、鸟及其他动物，这是一件华丽而完美的工艺品，令人赞叹不已。在桥东进口处，有两个漂亮而高大的雕像座，覆盖以大理石板，其上是按中国人表现形象雕刻的两只大狮子，在这两个狮子的腿间、背上、两侧和胸前，雕刻着各种姿态的小狮子，有的站立，有的蹲着，有的往下，有的朝上，其美丽精巧令人赞叹。向西的另一端，可以看见两个雕像基座，两头象，均用同样的大理石制成，制作的工艺和完美一如狮子。马可·波罗忘了描述这两者，除非他以后再予以补充。中国人断言这座桥已修建了两千年，至今一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但在1688年圣劳伦斯（St. Laurence's）节前夜，在持续全年的特大干旱之后，天开始下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到八月十六日，雨量到达顶点。八月十七日早晨约八点钟，洪水突然淹没新城及邻近的郊区和平地。人们马上关闭老城的城门，用混合的白垩、沥青堵塞洞穴和罅隙，防止水进入。但新城三分之一的房屋被冲毁，无数的穷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要么被淹死，要么被埋在废墟中。许多村落和房舍被凶猛的洪水冲走；邻近的城镇也遭到同样水灾。所有的人逃往高处避难；或爬到树顶，惊恐万状；或缺食昏厥，落入水中，惨遭没顶。更加奇怪的是在别的地方人们遇到由可怕地震引

起的意外灾害，看来这是上帝之意，要惩罚那些异教徒对基督教和福音布道者所施加的迫害。宫廷中也从来没有如此惊慌过，所有的人都陷入绝望之中，不能预测如此特大洪水的成因。最后，因北京无船，皇帝派人驾木筏去探视情况，他们发现我们所说的那条惹祸的河，洪水冲垮了闸门，冲出了一条新河道，河水越过田野和城郊；人心惶惶，十分恐惧，国王和贵人打算立即迁移别处。汹涌的洪水猛烈地撞击这座名桥的桥柱，并冲垮了两个桥拱。

第五个证明是 马可·波罗在同卷第三十二章中谈到那条鞑靼人称之为哈刺沐涟（Caramoran）的大河，中国人称之为黄河（Hoám Ho），即黄色的河，因为它带下来的黏土使河水变成那种颜色。在第三十六章他提到另一条他用中国话称作的江（Ô Kiam），即大江，我们已说过中国人称它为扬子江。第三十六章中描述了他称为 Kimsai^① 的城，他错误地称它为“天城”——这个名词我们将在下面指出，意思是宫廷。他报道了几个有关它的细节，例如，该城位于一个大湖和一条大河之间，湖的周围有宏伟的宫殿、和尚（Bonzes）庙宇及其他许多真实的东西。他说城市方圆是一百哩，这言过其实，他在这里表现得很像诗人而不像历史学家。总之，他对汗八里城和宫殿的描述足以表明契丹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他对 Kimsai 城的记载，足以证明蛮子是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因为他的大部分记述完全符合我们亲眼所见。然而，如果马可·波罗懂得中国语言，如他所说懂得鞑靼语一样，那么他就会更准确地记录、报道该帝国的城名和省名及其他情节。但他常把名字写错，这不足为怪。因为我们自己，在初来时，就以难以想像的勤勉去学习中国文字和语言，学了几年后对一部分词句仍常常迷惑和误解。所以我们不必感到惊奇，如果一位骑士，他只考虑以他的军事计划邀大汗之宠，并且仅跟缺乏学识、不通别国语言的鞑靼人交谈，就会犯下同样的错误。由于他把名字竟然错拼到如此程度，以

马可·波罗的 Kimsai 也可读作“行在”即皇帝的驻蹕地 指杭州。

致我们这些十分熟悉该国情况和语言的人，也要费尽力气去领会他的许多错误的含义。通过对地理位置的严加审查，参照他记述的其他情况，我们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卫匡国 (Martin Martini) 神父以他的中国地图而知名，以他的睿智博学，仍不免犯同样错误；甚至我们这些在该帝国生活多年的人，都难以理解他所谈及的人物和地方，特别是应以 -m 结尾的名字 他总是以 -ng 作结尾。例如，对于说 Pekim、Nankim、Chekiam、Yâmlie、Cûmchim 他一直写作 Peking、Nanking、Chekiang、Younglie、Cungching。其中他必定产生混乱，因为那种写法绝不符合中文的读音 它相当于我们的 m 读音 而不是 ng。这样说也没有帮助：德语读 I'm 几乎像 ng 的轻微开口音；因为德国人多少是用鼻音去读它。原来 m 这个字母，不管开口还是闭口发音，更相当于中国和拉丁的读音，而不像 ng 的读音。尤其是 因为德语词尾 I'm 发开口音更像 in 或 en 不像 im 或 em。所以这位神父，如果他用高荷兰 (High-Dutch) 语写作 即只按德国人的读音 那么这个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原谅；但既然是用拉丁语写作，而且为了全欧洲的方便，他应当遵照最准确和最通常的发音。

菲利普·克鲁维林在其著作第六卷第六章中，怀疑马可·波罗在第二卷第六十八章中提到的 Kimsai 城未必是鞑靼王，即中国皇帝的宫廷。他还有足够的理由声称马可·波罗夸张地描写所谓的 Kimsai 城。为解决这些难题 必须提出 他应当把 Kimsai 写成 Kimsu 即京师。因为 Kim 意为京 而 Su 是师：京城可以说是首善之区。当时 Kimsai 即 Kimsu 是宋 Sum 正室的宫廷 马可·波罗时候该王朝为西鞑靼人所推翻。百年后南京和北京成为明 (Mim) 王室的宫廷所在地，后来又被东鞑靼人所攻破。确认这点后，我要回答说，卫匡国神父（为避免行文冗长，我介绍读者去读他的书）很好地解释了这些难点，纠正了马可·波罗这个年轻人的夸大说法 他大大脱离实际 增添了许多东西。然而 马可·波罗所称的 Kimsai 有一万二千座桥的数字，卫神父认为是真实的，我却不愿苟

同。因为不仅我们所见并非如此，中国人在他们的著述中也记载了许多细节，而不会略而不谈那样重要的事。马可·波罗还谈到，有几座大桥，船只在下面航行时不会碰着桅杆。这绝无可能，因为不能想像，桥已全被毁坏，而未留下丝毫痕迹。据我所知，有个中国作家写了一篇谈论这个宏伟帝国的文章，下面我将引用他的记述，他既未提到杭州（Ham Cheu）城，即同一 Kimsai 的五座大桥，也没有谈到那些桥的高度，除非他是故意隐瞒。马可·波罗对这个城市的其他事的描述倒是真实的，只是按他的习惯略有偏差和夸大。为了澄清有关这个 Kimsai 城的疑问，特别因为卫匡国神父在其地图集第 109 页记述杭州时，和他在记述东、西鞑靼人时有所不同，因此我在这里摘录一段中国史书中的话。

一支王族要想列入这个帝国的皇室家族内，就必须征服全国或者大部地区。因为如果它仅征服两三个省，该王族只能被叫做旁朝（Pam Chao）即旁系国家，它也不能被认为是皇族的直系。我们现在所谈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公元 1200 年，东鞑靼的一个首领已征服这个帝国达数年之久，统治北京、山西和山东省，黄河将这些省和另十二个省分开。因此他自立为国王，称他的王朝为大辽（Tai Leao）。几年后，另一个东鞑靼的首领推翻了大辽，建立了新政权，称大金国（Tai Kin Que）即金国，一直延续到 1260 年。当时另外十二省在宋朝皇帝的统治之下。此皇帝的几个大臣劝他向不久前征服西鞑靼的大汗（Grand Han）献上丰厚礼物，求他帮助把鞑靼人从他们僭占的三省驱走。^①但他的另一些谋臣向他提出，挑动那支可怕的西鞑靼族去进攻与宋已保持若干年友好关系的东鞑靼人，将产生严重后果；引狮驱虎，并非良策。然而第一种意见终被采纳。于是大汗及他的鞑靼人，他们征服了许多民族，不久就推翻大金朝，占领了那三个，但他们结束这次征服后不久，就背信弃义地把

① 这里到的是金灭辽、元灭宋的事。

兵锋转向中国皇帝，后者当时以河南省黄河边上的一个城市为都城统治他的王朝。这位王公出于对他的蛮人邻居的惊恐，连忙逃往浙江省的杭州城，在那里建立他的朝廷。大汗很快得到有关消息，立即渡过黄河，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征服了河南、南京和浙江省，最后征服了杭州城，即马可·波罗所称的 *Kimsai*。中国皇帝因此逃往福建省，从那里进入广东，登上船只打算逃往外国避难，他的船只在海南岛港湾失事，他悲惨地死去，所以中国的其余地方都自动地服从大汗。”

这就是我从中国史书中所摘录的，由此明显可见杭州和 *Kim-sai* 是同一个城市，而 *Tai Kim* 这个词并非指一座山，而可以推测其意为金国。这是从前东鞑靼人取的王朝名。

第一章的注释和说明：

第 002 页：“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对此加以叙述”。

作者在序言中已谈到，未能完成他的著作，按照他的许诺阐述东鞑靼人的起源。然而几位作者对此作了一些记述，如卫匡国神父的《鞑靼战纪》及《中国地图集》序言；《荷兰使节出使中国记》；汤若望神父 1665 年在维也纳付印的信札；还有柏应理神父本年付印的《中国年纪》。据这些作者特别是后两位所述，看来自从东鞑靼人统治中国后，就没有国王，而那些王公的起源也不清楚，即使在现今，它还完全掺杂了神话传说。

汤若望神父报道说，当今皇上之父顺治（*Xun Chi*）帝的大伯曾几次告诉他说，自从恩库依（*Augela*）、正库依（*Chaugula*）和佛库依（*Faacula*）这三位女神自天而降，在鞑靼的一条河^①里沐浴以来，共有大约十代。佛库伦在她留在岸边的衣裳底下发现一种叫做阿尔卡肯吉（*Alkakengi*）的龙葵即一种草本植物结的红笨，佛库伦把它吞食后怀了孕。她的两个同伴返回天上，她则留在地上直到生

即长白山天池。

下一个男孩。她哺育孩子，后来把孩子留在一个岛上，告诉他说她将回到天上，但有一个渔夫会来教养他，这确实发生了。后来这个孩子成为一名勇士，他的子孙统治着当地。不过在第五代上百姓反叛了这个家族，该家族被打败并几乎被杀光，只有一个王子得以逃脱。这位王子遭到严酷的追捕，正当精疲力竭、濒临崩溃之时，一只喜鹊飞来栖止在他的头上，蒙蔽了他的敌人，他们以为那是一根树桩而不是一个人。由此可以看出，如汤若望神父所述，这个故事纯属神话。它表明，中国皇帝的家世极为暧昧，没有什么灿烂光辉的故事。后来发生的事却是明确无疑的。那位开国的人物，生活在这个世纪之初，为对中国曼达林谋害其父及施与他民族的其他暴行进行报复，对中国发动血腥的战争并由此变得十分知名。汤若望神父说，他是满渊 (Moncheu) 山谷的主子，卫匡国神父却认为满洲是一个大城。万历 (Van Liè) 帝命他管治那一山谷及邻近地区，条件是他应防御东鞑靼人的入侵，后者分为五支小部落。他的年号叫做天胤 (Tiel Mini) 死于 1628 年。他的儿子，一个更聪慧沉着的人，继续战争，直到 1634 年死去为止。天命的儿子崇德 (Cumtè) 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但他死于 1644 年满洲人占领全国之前。他的儿子顺治六岁在北京即帝位，死于 1662 年，以其子康熙 (Camtri) 为继承人，即当今的皇帝。汤若望神父的《鞑靼诸王表》为柏应理神父的纪年和鲁日满 (Rougemont) 神父的《中国鞑靼史》(*Historia Tartaro Sinica*) 所证实；《荷兰使节出使中国记》让我们知道，安文思神父有理由说鞑靼人既无国王，又无表示国王的词；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诸王起源于一个小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就是抢劫或游牧鞑靼人的大头目。

南怀仁神父的信札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包括全亚洲北部的鞑靼地被中国人分为东、西两部。两者的居民大多是放牧羊群等牲畜的游牧民，住在帐篷里。但西鞑靼比东鞑靼要强大得多，因为他们占据了北京省边境和蒙古、波斯及莫斯科诸地之间的土地；他们在圣路易士 (Saint Lewis) 统治时完全占领了这片土地。东鞑靼地

从辽东 (Leaotûm) 直达日本 (Japon) 包括朝鲜 (Corea) 以北的女真 (Niuchè) 省、女真以北的奴尔干 (Niulhan) 省、女真以东的玉披 (Yupi)、日本东北和玉披以东的耶窠 (Yeco)^①等地。但这些地方贫穷荒凉，人口稀少。那里一共不超过两三个小城；其余则是不毛之地，密布森林和山峦。然而当这些鞑靼人联合起来时却变得非常可畏，因为他们在严寒下劳作锻炼，而且几乎一直骑马，从事狩猎或忙于征战。他们以在公元前两百多年侵入中原而知名。在公元 12 世纪他们占领了辽东、北京、陕西、山西和山东省。但统治中国的鞑靼王公的祖先远未主宰东鞑靼地，他们并不是女真省的统治者，如前所述，那里有七八个君主。汤若望神父说，当现今在位皇帝的曾祖天聪^② (Tiencum) 进入中原时，部下不超过八千人；后来由于其他东鞑靼人的加入，人数很快增加；还有无数西鞑靼人，为他胜利的声名及大量俘获物的传闻所吸引而去援助他。

第 002 页：“撒马尔罕 (Chahamalaha) 国其居民为回教徒，并与陕西 (Xen Si) 省相近，。”

这个 Chahamalaha 之名，我确实相信，未出现在任何地图或其他记载上；但我认为我们的作者提到的正是卫匡国神父称为 Samahania 的国家；而且他说的地方，我把它当做是乌兹别克 (Usbegs) 的土地，也就是河中之地 (Mavralnara)，其首府是撒马尔罕 (Samarcand)，因为我们知道在陕西以西除它外没有其他回教王国。那里有几座大城、宫殿及漂亮的房屋，还有黄金储存和银盘及其他据卫神父报道的中国人认为在 Samahania 即 Samahan 国所有的东西。我们也不必惊奇于中国人称这个国家与陕西接境，因为他们从未向西旅行，没有其他有关位于西部国家的认识，他们仅从那些每两三年一次以使节的名义前来中国贸易的商旅队伍那里得

① Niulhan, Yupi, Yeco 对音不明，现仅译其音，其中称 Yupi, Yeco 在女真东和日本东北，前者或在朝鲜境内，后者在西伯利亚。

② 即皇太极，与上文中提到的崇德为同一人。

到消息。商人以此为借口前来中国，否则会遭到拒绝。他们集中在喀什噶尔(Cascar)国，如你可以在鄂本笃(Benediet Goetz)行纪中看到的那样，金尼阁神父把这篇行纪收录在他的撰述中。但从前特别在帖木尔兰(Tamerlan)时代，他把撒马尔罕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城市之一，商人们大多来自该城。所以很可能那些商人要表现声望，称他们自己都是撒马尔罕国人，而中国人缺少 R 字母，容易把 C 和 H 弄混，写作 Samahand 而非 Samarcand 。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人听说抵达陕西省最后一座城市肃州(Sucheu)的商人自称是 Samahan 即 Samarcand 的土著就误认为 Samahan 和陕西省接境。

第 002 页：“乌思国(Usanguè) ”。

这必定是卫神父叫做乌思藏(Usucang)的那个国家 在中国人叫做西番(Sifan)的国土内，位于四川(Suchuen)省之西。安德拉吉神父的报道中也称它为 Ussanguè 并且说它在西藏之东 距中国有二十天的行程。

第 002 页：“安东尼·德·安德拉吉(Anthony de Andrade)神父”等等。

安东尼神父两次旅行西藏。他的第二次旅行是在 1624 年 与贡撒罗·德·舒次(Goncalo de Sousa)神父同行，其行纪在 1628 年刊发于里斯本，其中清楚地谈及中国。我们在那里看到，它距乌思国(Ussanguè)即 Ussang 不超过二十天的行程；而乌思国距西藏王宫所在的加帕朗格(Caparange)不超过四十天的行程，神父们从阿格拉(Agra)动身，不到两个半月抵达那里，途经锡利纳加(Sirinagar)。至于契丹(Catai)因西藏百姓很愚昧 他们很含糊地向安德拉吉神父谈到它；他们向他声称契丹是一个大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道、卫神父的地图集和《鞑靼战纪》都告诉我们四川省和西藏相邻，西藏则位于大莫卧儿(Mogul)国之东 并不如我们的大多数地图所示的那样，把它置于其北。尤其是，因鄂本笃神父在他的行纪中说他一直向大莫卧儿国北部行走，从乌兹别

克国不断东行，直到中国。

第 003 页：“如我们在谈鞑靼字母时将适时指出”。

安神父未能完成他的著作，没有谈及这种鞑靼字母。但这将见于南怀仁神父即将在巴黎付印的一部语法书中。

第 004 页：“Mangi 一名来源于蛮子……意为野蛮人”。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o) 神父 1598 年从中国写的一封信于 1601 年以拉丁语刊于马耶斯 (Mayence) 其中告诉我们，中国人把广东省人叫做 Mangi，也就是说蛮人。Manginos 当即蛮族，这证明了安神父的说法。

第 006 页：“石煤”及中国的“暖室”。

几乎所有谈中国的作者，都一致说北方诸省的寒冷大大超过应有的程度，以为其温度是在零下四十度或四十二度以下。他们还谈到普遍使用的炕，在北方诸省构造相类似。见金尼阁神父的记载，第四卷第三章，曾德昭神父的著作，第一部第三章及卫匡国神父地图集中对山西、北京省的记述，那里他说他们采煤的两座山离平谷 (Pim Ko) 城不远，叫做岐 (Kie) 和岁武 (Siu Vu) ①。

第 008 页：“导致马可·波罗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往西大约三里格远”等等。

卫神父在记北京省时用下面的话来证实这一推测。“卢沟 (Lu Keu) 河，也叫做桑乾 (Sangean) 河，流经皇城西南。你经过一座漂亮的桥，人们可以在上面数若干石拱，显然他谈到的建在这条流经北京以西的河上面的桥，就是马可·波罗所记述的桥。”因此卫神父称它为 Sangean 和马可·波罗叫它 Sangcan 即 Buli Sanggan，没有多大的区别。聂仲迁神父在他的《中国史》第三卷第八章中谈到一座东面的桥如下：在北京有一座构造美妙的桥，长度超过三百步，它的两个桥拱破裂。安神父曾述及 1668 年 8 月 9 日两个桥拱坠毁的原因。聂仲迁神父补充说，桥的其余部分于同年

① Pim Ko, Kie, Siu Vu 对音不明，仅译其音。

8 月 26 日坍塌。他还说它叫做卢沟桥 (Lo Co Kaio) 修建已有千年，距北京不超过六里格远。鲁日满和殷铎泽神父在他们的记述中肯定桥的余下部分于 1688 年 8 月 26 日毁坏 距它始建已有三千年。另外鲁日满神父还告诉我们，这座桥有三百六十步长。

第 010 页。

安神父的这些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他的意见与那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作家记录中国的实际相符合，例如德国神父汤若望、法国神父聂仲迁、意大利 神父曾德昭、弗来明 Flemming 神父鲁日满等等。而卫匡国神父的说法，只与出使记的作者的描述相同，后者要么抄录，要么引用卫神父记中国的话——除了记使臣从广东到北京的行动及他们的协议外。所以不足怪的是，在拼写上上一个模仿另一个。聂仲迁神父也在他著述的序言中不同意卫神父的说法，说中国字应按我们作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读音。

第 010 页。

我们还有种种理由证明契丹正是中国，根据马可·波罗谈到的丝绸，许多果实、植物和动物都只出自中国，而在鞑靼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一点在这百年来常被议论到，除我们的作者提到外，谈这个题目的作者都用许多不同的理由去论证它，因此再去讨论它是没有必要的。此外现在没有人能对此说法提出有根据的质疑，除非他甘于盲目无知；我将仅指出过去人们迷惑的原因如下。当西鞑靼人占领中国时，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宋朝的中国王室皇帝，他占据南方十二省；另一个是大金朝的东鞑靼王，他占据北方三省、辽东地区及东鞑靼地。这两个皇帝一个接一个被打败，然后他们的国土在 1225 年到 1280 年之间被征服。明白这点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东方的作者及那些听说这些征服的人，容易相信真正的中国皇帝是全中国的统治者，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而另一个大金朝的皇帝，他的国家更偏北，位于长城以北的鞑靼地。

应为葡萄牙。